

翦伯赞全集

第四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翦伯赞全集

第四卷

中国史论集 第三辑
历史问题论丛 增补本

河北教育出版社

说 明

本卷收《中国史论集》第三辑和《历史问题论丛》增补本两种。第三辑所收，都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论文，“文革”后，曾以《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二辑之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次编全集，将其中的《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等4篇收入全集第三卷中，其余35篇又补入《“人与兽争”时代的生活方式》、《解释中国史前史上的几个问题》和《“彼有其具”——书〈三国志·蜀志·简雍传〉》3篇，为《史论集》第三辑，计收论文38篇。

这些论文都于近年进行了校订，主要是核对资料，增补引文出处或做必要的注释，改正错讹衍漏文字和标点符号。

参加校订工作的有张传玺、田珏、吴宗国、张怡青等，张传玺负责全部检校和编辑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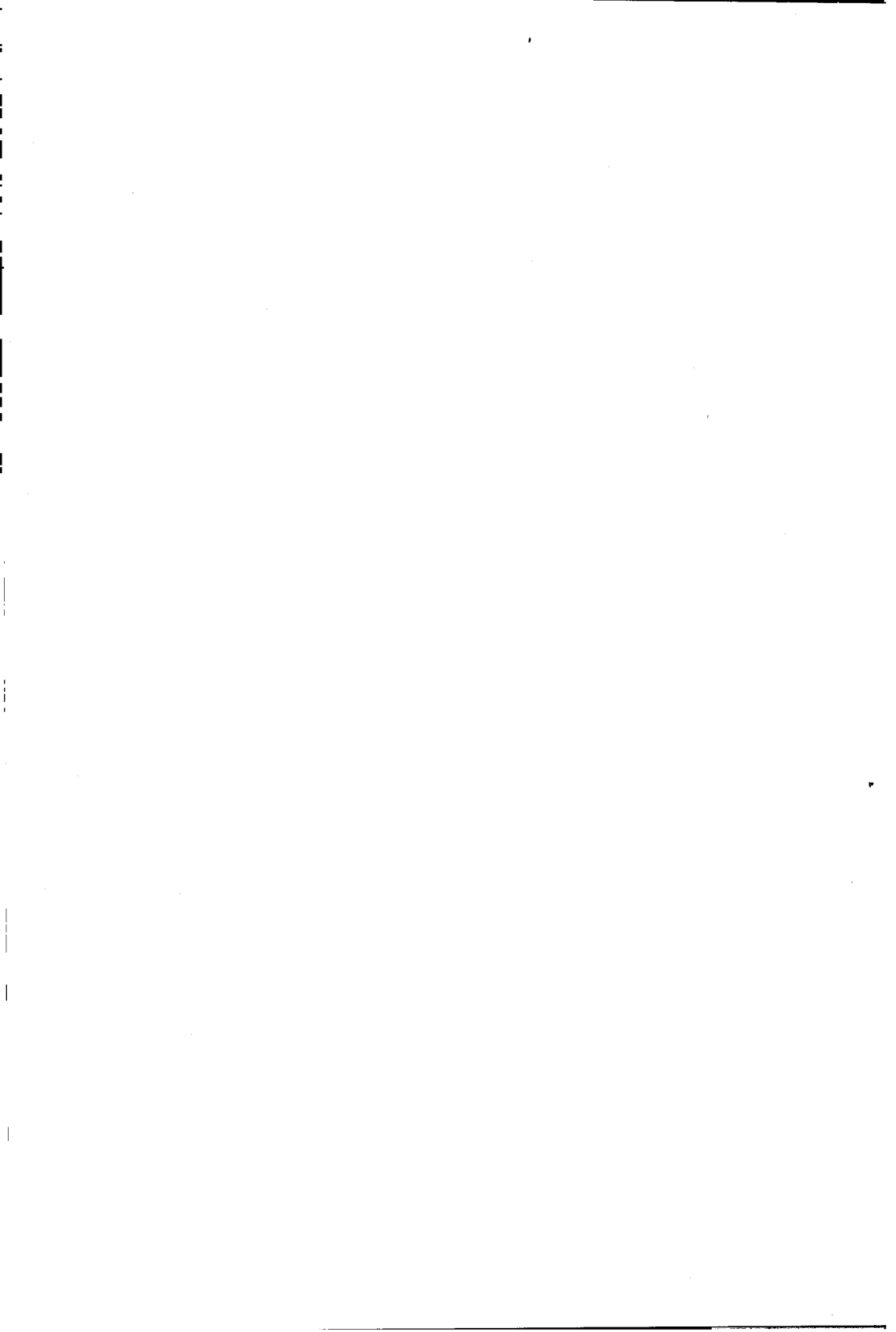
张传玺

2000年元月7日

本卷目次

- 中国史论集 第三辑 (1)
- 历史问题论丛 增补本 (325)

中国史论集
第三辑



目 录

论中国史上的正统主义	(5)
正在泛滥中之史学的反动倾向	(9)
学潮平议	(14)
评南北朝的幻想	(19)
末代帝王的下场	(22)
——逃跑、投降、自杀、被俘	
从历史上看中共的土地改革	(25)
“人与兽争”时代的生活方式	(29)
舶寮岛史前遗迹访问记	(42)
关于台湾的石环及其他	(53)
——复李规先生	
附：李规先生来信	(56)
解释中国史前史上的几个问题	(58)
——答复王尔宜君提出来的问题	
附：王尔宜君来信	(74)
序费德林博士《屈原新论》	(80)
秦汉史料新研	(82)
——《中国史纲》第二卷序言	
关于传国玺答文芳先生	(88)
附：文芳先生来信	(89)
论东汉末的党锢之祸	(90)
——中国士大夫所领导的第一次政治抗争	
三国时内战中的民族军队	(103)

“彼有其具”	(107)
——书《三国志·蜀志·简雍传》后	
孙皓的末日	(109)
补三国食货志	(115)
魏晋时代之塔里木盆地及其与中国的关系	(140)
论西晋的豪门政治	(154)
“九品中正”与西晋的豪门政治	(167)
西晋的宫闱	(175)
东晋初黄河南北的坞屯垒壁	(179)
《晋书·祖逖传》书后	(186)
杜甫的世系及其家属考	(190)
陈东与靖康元年的太学生伏阙	(195)
评《清宫秘史》	(206)
在义和团暴动的背后	(210)
台湾番族考	(215)
历史学上的人名、地名与年代	(271)
关于历史知识的通俗化问题	(275)
——兼答吴兰先生	
附：吴兰先生来信	(278)
致初老信	(280)
我和行知先生	(283)
复冯玉祥先生书	(295)
追怀冯玉祥将军	(300)
张炎将军殉难四周年祭	(309)
回忆歇马场	(311)
记古圣寺	(321)

论中国史上的正统主义

在中国的历史学上，自古以来，就流行着一种正统主义的观念。所谓正统主义，即在中国史上的任何时代，都要指定一个统治集团，作为合法的政府，以之承继正统，而以与这个合法政府同时并世之其他的政治集团为非法的僭伪政府。几千年来，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史学家，还在哓哓于正伪之辩。而且这种正统主义观念，今天仍然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发生它的作用。

其实所谓正统主义，完全是封建统治者用以辩护其“家天下”之合法的说教；而其出发点，则是“皇帝至上”的思想。因为封建时代的历史家，以为历史就是圣帝明王的承续，因而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一日无君，即认为是历史的中断。所以在任何时代，都要找一个皇帝，系之以正统。这个正统的皇帝，最好是圣帝明王；但是如果当时没有这样理想皇帝，则不管是流氓，是地痞，是大盗，是狗偷，甚至是他们鄙为夷狄的异族，只要他取得了对中国的统治权，他就被尊为神圣，被当作正统。

例如刘邦未做皇帝以前，本是一个“贪于财货，好美姬”^①的流氓，又曾隐于芒砀山为“盗”，他的身分可以说是流氓而兼“强盗”。但《汉书·高帝纪》谓其一人咸阳，便摇身一变而为“珍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的圣人。朱温在《唐书》上曾被指为盗贼，而在《五代史》上遂被尊为神圣。燕王棣在同一《明史》上，以前指为叛逆，以后又奉为神圣。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都是沙陀的苗裔，而汉族的历史家竟奉为五代之正统。辽、金、元、清诸代的统治者，或为契丹，或为女真，或为蒙古，而汉族的历

^① 《史记·项羽本纪》。

史家，亦称之为祖为宗。像这样今日流氓，明日皇帝；今日盗贼，明日神圣；今日寇讎，明日祖、宗的正统主义，充满了中国史乘，举不胜举。

封建时代的历史家，一方面抱着天下不可一日而无君的思想，但同时又认为天无二日，人无二王，即认为在同一时代，不能有两个以上的皇帝。因而如果有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皇帝时，他们便从中选择一个，尊之为神圣，奉之为正统，而以其余为僭伪。例如在三国时，有三个神圣，所以历史家或以魏为正统，或以蜀为正统。南北朝时，南方有一群神圣，北方也有一群神圣，所以南方的历史家指北方的神圣为索虏，北方的历史家说南方的神圣是岛夷。五代十国时，中国出现了一大批的神圣，于是历史家便择定梁、唐、晋、汉、周为正统。像这样任意正伪的正统主义，正如司马光所云：“宋魏以降，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穷新，运历年代，弃而又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

神圣一经确定，则为不可侵犯之象征。如果再有人反对这个神圣，不管反对得有无理由，都一律被指为盗，为贼，为匪，为叛，为逆。

实则神圣与盗贼相去无几。陈涉、吴广之于刘邦，新市、平林之于刘秀，窦建德、刘黑闥之于李世民，张士诚、陈友谅之于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之于清顺治，其间相差，实间不容发。然而即因成败不同，而遂或为神圣，或为盗贼，由此而知神圣与盗贼之分，不在其人之性格，而在其成败。正确的说来，只有从神圣中才能找到真盗贼，从“盗贼”中才能找到真神圣。黄黎洲之言曰：

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今也有负数匹布或担数斗粟而行于涂者，或杀之而有其布粟，是贼乎？非贼乎？……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乃反不谓之贼乎？三代以后有天下之善者莫如

汉，然高帝屠城阳，屠颍阳，光武屠城三百，……古之王者，有不得已而杀者二，有罪不得不杀，临战不得不杀，……非是奚以杀为？若过里而墟其里，过市而窜其市，入城而屠其城，此何为者？大将……偏将……卒伍……杀人，非大将、偏将、卒伍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之，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天子实为之大手……百姓死于兵与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声未绝，于是乃服袞冕，乘法驾，坐前殿，受相贺。高官室，广苑囿，以贵其妻室妾，以肥其子孙，彼诚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

如黄黎洲所云，则自秦以来的所谓神圣，都是一些杀人犯，而中国的历史家却以杀人犯之世代相承为正统，以反对杀人犯者为盗贼，岂不是非倒置！所以黄氏又说：“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以汤武不当诛之……岂天下之大，于兆民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乎！”

正统论者，一般方面，是“皇帝至上”的历史观之演绎；在特殊方面，他们又是历史地辩护现存统治者的合法。例如以三国而论，陈寿以魏为正统，而习凿齿则以蜀为正统；以后司马光又以魏为正统，朱熹复以蜀为正统。这样不同的主张，并不是根据客观的实事，而是历史家要主观地辩护其当时的政权。关于这一点，梁任公说得很正确，他说：

陈寿主魏，主都邑也。寿生西晋，西晋据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习凿齿主蜀者，主血胤也。凿齿生东晋，晋已南渡，苟不主血胤，而仍沿都邑，则刘、石、符、姚正，而晋为僭矣。故凿齿之正蜀，凡亦以正晋也。其后温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温公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与晋之篡魏宅许者同源，温公之主都邑说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

与江东之晋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说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盖未有非为时君计也者。

又如五代十国而选择梁、唐、晋、汉、周为正统，这也是宋人为自己的政权辩护。因为宋代的政权篡自后周，为了正宋，不能不正周。为了正周，于是又不能不正梁、唐、晋、汉。所以宋人正梁、唐、晋、汉、周，也是为了辩护宋代政权是历史的正统。

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辽、金、元的情形类似。所以顺治二年，议历代帝王祀典，礼部上奏，主张把辽、金诸帝送上祭坛，几乎要以辽、金为正统而以宋为僭伪。清人之正辽、金，也是为了辩护自己政权的合法。

民国初，北洋军阀修清史，以清为圣朝而指太平天国为发匪，即正清而伪太平天国。他们之所以正清而伪太平天国，也是辩护承继清的北洋军阀的政权是正统，而从太平天国发展出来的辛亥革命和由此而建立的国民党的政权是僭伪。

晚近又有人企图把某一个人尊为神圣某一党派奉为正统。他们不惜尊奉汉奸曾国藩为圣人，以否定太平天国的合法性，其用意也是企图以正曾国藩者正现在的人民屠杀者，以伪太平天国者伪现在的人民军。

这样看来，所谓正统主义，就是以“皇帝至上”、“封建世袭”为原则辩护现存的政权之合法性的工具。诚如梁任公云：“若以此为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兽也？而陋儒犹器器然曰：‘此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伦也，国之本也，民之防也。’吾不得不深恶痛绝，夫陋儒之毒天下也，如是其甚矣！”

（重庆《民主星期刊》第十九期，1946年2月20日；

延安《解放日报》1946年4月10日）

正在泛滥中之史学的反动倾向

近来，在中国史学的领域中，有一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复古的倾向，表现于有人企图把中国的史学研究，拉回古典学派的道路。这里所谓古典学派，即指乾嘉学派的“末流之末流”。

我要着重地指出，这种复古的倾向，是中国史学向前发展的一个反动。这种反动，不是几个抱残守缺的学究之个人的行动，而是“当作一个阶级的愚民政策”之一部而出现。这个阶级，现在正向全国的人民宣战，他们企图用资本主义的武器，保卫封建的统治，因而史学的复古运动者，也就企图以腐朽的古典学派作武器，进攻科学历史学派的城堡。

文化的复古与政治的反动是分不开的。有王莽的篡汉便有刘歆出现为新莽王朝的国师，替王莽窜乱经传，以说明王莽篡汉之符合于圣人的教义。刘歆虽然和王莽一同埋葬了，但“刘歆型”的文化奴才，直到现在依然存在。这说明了只要有人想做王莽，就有人愿做刘歆。

今天中国虽不是王莽的时代，然而却有人想做王莽的事业。因而文化的复古，还是当前重要政治任务。具体的事实指示出来，早在抗战期间，学术的复古就在不断地蠢动，特别是史学的复古。因为现实的斗争在史学中反映得格外强烈，格外鲜明。

我记得在抗战的首都重庆，曾经召开过一次所谓“全国历史学会”。在这次会议中，应诏而至者有二百以上大学和专科的史学教授。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组成一个古典派的史学阵容，以对抗科学的历史学派。不幸因为缺少一个领导人物，这次会议算是白开了。

抗战结束，内战展开，政治反动日益强烈，因而史学复古的

要求更加迫切。恰好这时就有刘歆那样的文化奴才从美国回来，自告奋勇，于是酝酿已久的史学复古运动终于展开了。

说到这位复古运动的领导者，大家应该记得，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曾经揭起实验主义的旗帜以与古典派为敌。现在为什么又转而投到古典派的旗帜下呢？很明白，这不是他个人兴趣的转换，而是他前后的政治任务不同。在“五四”前后，中国市民阶级和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敌人是封建残余。当作一个市民学者或文化买办，他的文化任务，当然是反对作为封建残余的意识形态的古典派。现在，中、美两国反动派之共同的敌人，是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因而当作一个共同的文化奴才，他的任务自然是纠合一切保守、落后、腐朽的学究，以与新的科学历史学派为敌。不过，和中国的封建残余之为美帝国主义的傀儡一样，中国的古典学派也不过是美国文化买办玩弄的古董而已。

古典派（即乾嘉学派的本身）并不反动；只有在两百年后的今日，重新回到这个学派才是反动。因为各种学派都有他自己的时代。在他自己的时代里都有进步性。古典学派治史的方法，在乾嘉时代是崭新的方法，这表现于它反宋明理学踏空的作风，而以无信不征的精神，开辟了实事求是的学风。

但是研究学问的方法是与时俱进的，跟着时代的前进，就会出现更新的方法；而过去之新的方法，就会变为陈旧。乾嘉学派也不能例外。自从逻辑学的方法传到中国，乾嘉学派的方法即已相形见绌。到现代中国的史学，已经踏上科学的阶梯，乾嘉时代的方法自然更显得幼稚了。

假如把史学方法比作镜子，则乾嘉学派的方法是铜镜，逻辑学的方法是玻璃镜，而科学史观则是 X 光线。至于乾嘉学派的末流之末流，他们手中所有的，则不过是他们祖传下来的一面生了锈的铜镜而已。因而复古主义者在今日而提倡乾嘉学派，这就无异放着 X 光线不用，而主张使用一面生了锈的铜镜。

诚然，乾嘉学派也留下了光辉灿烂的成绩。这种成绩，直至现在还被视为中国学术中之最珍贵的遗产。他们对于史学的贡献，

也有不朽的劳绩，特别是对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不过，他们的努力也就止于史料的整理而已。假如史学的任务不仅是整理史料，还要写成完整的历史，则乾嘉学派对于史学所作的工作只是一半。

而且就这一半工作而言，他们所做的又仅限于文献学方面；对于考古学、民俗学的史料，并未着手，因而对于上古的努力，只是写成了一些神话传说的汇编。其对于有史以后的史料之考证补注，大抵亦以文献为据。假如史料的范围不限于文献，而还存于文献以外，则乾嘉学派整理史料所做的工作只是一半。

再就这一半的一半而说，乾嘉学者所作的工作，又偏于僵死的一面。例如就其所补各史表志而言，十之八九为地理志，其次为经籍志，又其次为天文志、律历志，而对于与社会经济有关的食货志，对于与生活习惯有关的舆服志，对于与艺术活动有关的乐志，则无人措意。他若保存在历代文艺作品中的史料，更是原封未动。假如保留在文献中的史料，除僵死者外尚有生动的部分，则乾嘉学派对于文献学上的史料之整理，又只作了一半。

总而言之，所谓乾嘉学派的史学，其全部内容，就是史料的考证与整理；而史料之考证与整理，又偏于文献学方面；在文献学方面，复偏于僵死的部分。这对于史学而言，只是作了一个局部而又局部的准备工作而已。

以上是就乾嘉学派的鼎盛时代而言。降及末流，则专以摭拾丛残、毛举细故为能事，因而支离烦琐，愈趋芜秽。对于这些末流，章实斋曾有这样的批评：

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目，以谓高情胜致，互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遂于时趋，而误以攀绩补苴，谓足尽天下之能事也。幸而生于后世也；如生于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

梁启超也说：

总而言之，清儒所做辑佚事业，甚勤苦，其成绩可供后世专家研究资料者不少。然毕竟一抄书匠之能事耳。末流以此相矜尚，治经者，现存的三礼郑注不读，而专讲些什么《尚书》、《论语》郑注；治史者，现成的《汉书》、《三国志》不读，而专讲些什么谢承、华峤、臧荣绪、何法盛；治诸子者，现成的几部子书不读，而专讲些什么《鬻子》、《燕丹子》；若此之徒，真可谓本末倒置，大惑不解。

末流如此，至于末流之末流，即今日之所谓古典学派，则更等而下之。他们再没有他们先辈那样的智慧魄力和学问，进行大规模的史料的辑补和考证，只是抓剔糟粕，吹求阙失，企图抄袭陈说，翻为新论；钩稽幽隐，用眩流俗。而其所钩稽与所吹求，又皆支离断烂，无关弘旨；僵死干枯，绝无生气，正如一大旧货摊，破铜烂铁，无所不有，而一无可用。然而他们却人人自以为握灵蛇之珠，个个自以为怀荆山之玉。不知其所握所怀，都是破铜烂铁。退一步说，即偶使有珠玉，他们也不能琢以为器，贯而为串，依然为无用之物。

一言以蔽之，今日之所谓古典派，实已由“史料的整理”堕落到“史料的玩弄”。然而他们却以为史之为学，就是“史料的玩弄”；而且只有玩弄史料，才算是史学的正宗、史学的上乘、史学的专家。实则这些玩弄史料的专家，正是章实斋之所谓“横通”，盖琴工碑匠之流亚。然而他们亦遂江湖挥麈登坛说法，器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于横也。

任何人都知道，史学的任务决不是史料的玩弄，亦不止于史料的整理，而是要辩证史料，综合史料，写成完整而有系统的历史。然而今日之古典派，他们以为只要把史料变成历史，便不算史学。

诚然，史料的整理与鉴别，是研究历史最基本的工作；但史料不就是历史，正犹砖瓦不就是房屋，秫黍不就是酒。然而今日

之古典派，却指史料为史学，是直指砖瓦以为房屋，指秫黍以为酒，其为错误，尽人皆知。

任何学问都要依从正确的方法，才能得到正确的说明。历史也是一样，没有正确的方法，则虽有史料，也不会成为说明历史的资料，“正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

没有方法，不但不能写成历史，即搜集史料也不可能。因为史料并不像放在钱柜里的金银，随手可得；而是像矿石一样，埋藏在人所不知的地方。没有采矿学的知识，虽身入宝山，也只有空手而回。今日的古典派即使据有宝山，也是枉然。

古典学派已腐烂至此，何以复古运动者还要提倡他呢？这就是因为这个学派具有回避现实，学以为学的传统，足以愚弄青年，僵化青年。他告诉青年，治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致用，而是为了娱乐；不是为了从历史上吸收经验与教训，而是昏迷于废纸堆中，不省人事。这样习而久之，一个青年便会变成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废物，便会变成不辨黑白、不辨是非的呆子，从而他们就会把独裁当民主，把人民当土匪，把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当“法律问题”，特别会把《水经注》当作最了不得的学问。这样，一个青年便会白首寒窗而至死不通。结果，和蠹鱼一样葬身于断简残篇之中。

假如古典派之玩弄史料是“玩物”，则复古运动者之愚弄青年，便是“玩人”。但是，我要正告复古运动者，今天的青年，已经不是乾嘉时代的青年，他们是不会被玩弄的。他们对于专制独裁的暴政，不是容忍，而是反抗，他们决不会从斗争的前线退到“时代的后院”。他们正高举唯物史观的旗帜，把科学方法当作 X 光线，照明中国史发展的规律、过程及其倾向，照明反动者的五脏六腑，当然也会照出刘歆的心肝。

（上海《文萃》第二年十五、十六合刊，
1947年1月22日出版）